

大连方言阴平调变异的社会语言学分析

高玉娟

(辽宁师范大学 外国语学院, 辽宁 大连 116029)

摘 要: 本文运用社会语言学的变异理论和研究方法, 以大连方言中最具特色的阴平调为语言变项, 对在市区内采用滚雪球方式获取的受试者发音样本进行考察, 探究阴平调在不同社会群体中使用的变化, 分析影响阴平调变异的社会因素, 从而在一定程度上预测当地方言未来的发展趋势。研究发现, 大连方言阴平调发音的变异是一项正在进行的变化。变异体现一定的社会分层, 不仅与被试年龄密切相关, 还与受教育程度以及职业因素有关。阴平调发音的地方变式虽不会在短时间内消失, 但是其普通话变式的使用率越来越高, 向普通话靠拢的趋势越来越明显。普通话的大力推行和普及是引发变异的强大社会动力, 语言心态和人口流动等的影响也是大连方言阴平调变异的重要原因。

关键词: 社会语言学; 大连方言; 阴平调; 变异

中图分类号: H1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1751(2018)05-0086-08

随着经济的飞速发展、人口的大幅流动、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以及普通话地位的提高, 大连城市的语言生活面貌也发生了变化。初步观察发现, 大连方言无论在词汇的使用还是声韵调的发音上都存在变异。对此, 本为运用社会语言学变异理论和研究方法, 以大连市内方言中最具发音特色的阴平调为语言变项, 考察其发音的不同变式在不同社会群体中的使用情况, 找出可能影响大连方言阴平调发音变异的社会因素, 并在一定程度上预测当地方言未来的发展趋势。

一、大连方言的声调特点

在方言的归属上, 大连方言与山东半岛同属胶

辽官话, 但由于特殊的地理位置和环境, 大连方言长期以来受到胶辽官话和东北官话的影响而不断发展, 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海蛎子味”极浓的地方话。大连辖区内方音不尽相同, 本文所讨论的大连方言指的是大连市区的方言。根据辽宁省方言调查组在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所做的调查, 大连市区有 22 个声母, 35 个韵母, 与普通话大致对应。有 4 个单字调(轻声除外), 即阴平(312)、阳平(34)、上声(213)、去声(53)。虽然与普通话一样都是四个声调, 但大连方言的阴平是个低降调, 而且带有些曲折, 这是其区别于普通话的主要特征, 也是最具大连味的发音。但据高玉娟(2006)通过声学分析结合听辨实验认为, 大连方言的阴平调正在发生变化, 由原先的低降升调向高降

收稿日期: 2017-06-07

基金项目: 辽宁省社会科学规划基金项目“辽宁方言语音变异与变化研究”(L15BYY013)

作者简介: 高玉娟(1965-), 女, 山东青岛人, 辽宁师范大学教授, 博士, 主要从事社会语言学、实验语音学以及第二语言习得研究。

* 在本文写作过程中辽宁师范大学硕士研究生刘家宁、郑雅楠给予了诸多帮助, 在此表达诚挚谢意。

调变化的趋势明显^①。本研究中,无论被试发的是低降调还是高降调,我们都认为他说的是大连话。

本文采用社会语言学变异理论及研究方法对大连方言阴平调发音的变异进行考察。语言变异指的是,在日常生活中,人们使用的语言呈现出丰富的多样性。个人的语音、词汇、语法也都不完全相同,特别是不同社会群体之间存在语言差异。语言变异理论认为,研究语言必须联系语言外部的社会因素,从社会各个方面研究语言在社会中的实际面貌。不仅研究对象要以日常话语为素材,且要考虑说话人的社会背景、年龄、性别、职业、种族、风格等因素。研究方法是现实生活中收集大量的、分布不均衡的语言事实,从相关的社会因素中寻找不均衡的原因,并分析哪些是已经完成的变化,哪些是正在进行的语言变异,从而说明语言变化的原因和规律^②。无疑,用社会语言学的变异理论和研究方法,对城市方言语言变异进行研究是当前语言研究的重要课题。

二、调查过程

(一)语言变项和语言变式

按照社会语言学变异理论,如果某一语言形式在不同的语境中具有不同的表现形式,那么这一抽象的语言形式就是一个变项(variable)。这些不同的具体表现形式即为该变项的变式(variant)^③。如,现代汉语中的第二人称单数就是一个变项,两种具体的形式“你”和“您”就是两个不同的变式。再如,英语中的现在分词-ing,有人读作[-in],有人读作[-iŋ]。现在分词的标志-ing就是一个变项,其两种发音形式就是两个具体变式。语言变异研究就是要探明何人何种情况下使用何种变式,找出其中的规律。

本文所说的大连方言,指的是在大连市内各区使用的方言。大连方言的阴平调是一个降调,其发音最能代表大连地方特色。然而据观察,在许多人的发音中出现了普通话的高平调。因而本文要考察

的变项即为阴平调发音,两个具体的变式为:变式一,发成地方音的降调(包括高降和低降);变式二,发成普通话的高平调。

(二)调查目的与研究假设

本文对大连方言阴平调这一变项的两个变式在不同人群中的使用情况进行考察,分析其变异与社会因素的关系,说明变异的原因和外动力,并对当地方言发展的趋势进行预测。期望本研究不仅有利于说明这一地区的语言使用情况,更可为国家语言政策的制定和语言规划的实施提供调查依据^④。

根据研究目的并联系日常观察,本文提出研究假设。假设一,大连言语社区中不同社会群体对阴平调的发音各不相同。假设二,大连方言阴平调发音受到声望高的普通话的强烈冲击后发生了变异。为了验证上述假设,我们使用滚雪球的抽样方式选取不同年龄层次、职业、性别、受教育层次的106位发音人的阴平调发音样本进行分析。选取调查对象的标准是年龄超过12岁的,父母都是大连人,在大连出生和长大,并在地居住不超过10年的,平时主要说大连话的大连人^⑤。

(三)发音材料及调查过程

调查材料包含大连话的阴阳上去四个声调在内的单字表。字表共包含生活常用字30个,其中阴平字共12个,其他声调字共18个。所有字均选自《方言调查字表》^⑥。为避免发音受到惯性作用,保证数据准确,我们将四个声调的单字打乱顺序组成发音表。录音前先请被试简单熟悉发音材料,然后用平时说的大连话尽可能自然地说出字表中的字。

三、发音总体数据分析

大连方言与普通话的主要区别在于其阴平调是一个降调,而普通话阴平调是一个高平调。调查结果显示,106名被试对于阴平调的发音存在明显差异。具体情况见表1。

①高玉娟.大连方言声调研究[M].大连:辽宁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214.

②转引自陈松岑.语言变异研究[M].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2001:60.

③徐大明,陶红印,谢天蔚.当代社会语言学[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100-101.

④高玉娟.语言变异视角下的锦州方言语音研究[J].辽宁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40(5):90.

⑤高玉娟.大连方言五项语音变化的社会语言学分析[J].南开语言学刊,2005(5):51.

⑥中国社会科学院.方言调查字表[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14-28.

表1 被试阴平调总体发音情况

发地方音变式数量/个	人数	百分比
0	14	13
1~2	26	25
3~5	26	25
6~8	21	20
9~11	19	18
12	0	0

表1显示,被试对于大连方言阴平调地方音变式的发音特征保留的情况不尽一致。其中14位被试的发音中没有出现阴平调的地方音特征,而是完全变成了普通话的发音,占被试总数的13%。另有25%的人只是偶尔保留了地方音的成分。表中最后一行数据也很说明问题,即没有一个人完全保留地方发音,而是或多或少融入了普通话成分。表1数据还说明,虽然大部分大连人阴平调发音中仍然或多或少保留了地方方言的降调特征,但保留的数量越来越少,而普通话高平调的使用率越来越高。

上述数据只是一个总体情况的反映,因为被试的背景来源复杂,涉及年龄、性别、职业以及教育程度等差异,所以具体还应结合这些社会因素进行分析。

四、阴平调变异与社会因素的关系

社会语言学认为,考察语言的变化应该联系语言外部的诸因素,如年龄、性别、职业、受教育程度,以及种族、语体等,以便找出它们之间可能存在的联

系^①。本文中的调查对象均是汉族人,居住在大连市内四区,所有被试均采用朗读词表语体,因此本文调查对象的种族、语体均是相同的。本文将联系性别、年龄、职业、受教育程度四种社会因素来探讨影响大连方言阴平调读音变异和这些因素的关系^②。

(一)年龄因素与阴平调变异

社会语言学认为,年龄是影响语言变异的一个重要因素,因为语音的变化不仅是动态的,而且是在时间的维度上展开的。也就是说,不同年龄人的语言状况也就代表了不同时期的语言面貌^③。根据语言变异现象在同一时期几代人或几个言语集团上的分布,我们可以了解这种语言的历史演变过程,并设想若干年后其变化的大致历程^④。

据此,本文将全体被试按年龄分为7组,分别统计各年龄组被试使用阴平调大连地方话变式(V1)和普通话变式(V2)的百分比平均值。具体情况见表2(表中只列出V2使用的百分比平均值)。

表2显示,71岁以上年龄组阴平调普通话变式(V2)使用率最低,为27.80%。随着年龄的降低,使用率越来越高,至最年轻一代即20岁以下年龄组使用率最高,达到77.23%。这一共时的变化足以说明大连方言阴平调发音几十年来在不断地向普通话标准语变式演变。图1为各年龄段发音人阴平调普通话变式使用的分布图,会更加直观地表现这一变化的趋势及速度。

表2 年龄与阴平调普通话变式使用百分比的平均值

年龄/岁	被试人数	普通话变式(V2)平均使用率%	标准差	标准误差
12~20	15	77.23	28.08	7.25
21~30	18	68.06	32.60	7.68
31~40	20	66.25	30.64	6.86
41~50	15	48.89	33.00	8.52
51~60	15	45.01	30.18	7.79
61~70	14	45.82	27.68	7.40
71以上	9	27.80	17.18	5.73

①王士元,沈钟伟. 词汇扩散的动态描写[G]//王士元语言学论文集.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119.

②高玉娟,邵钟萱. 社会语言学视阈下的沈阳方言语音变异研究[J]. 辽宁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29(5):132.

③王士元,沈钟伟. 词汇扩散的动态描写[G]//王士元语言学论文集.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119-120.

④王立. 汉口话[t_ɿ]声母字读音变异及其原因分析[J]. 语言文字应用,2004(1):4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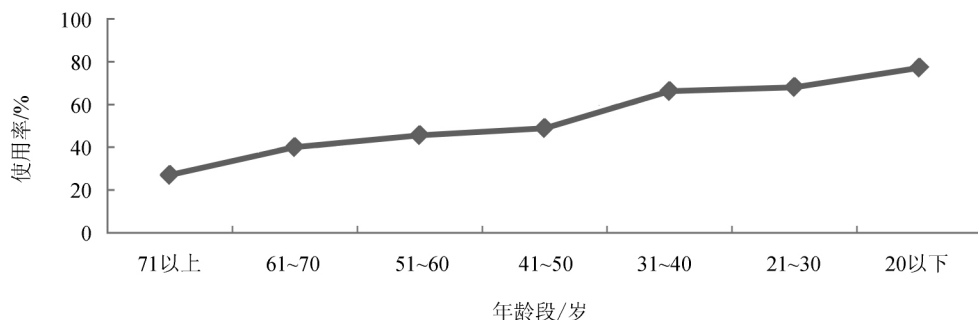


图1 阴平调普通话变式(V2)在各个年龄组的使用分布

从阴平调普通话变式(V2)出现的年龄分布推断,大连方言阴平调发普通话高平调的音这一现象约在50年前就出现了。起初变化相对较快,61~70年龄组比上一年龄组高出了12.3个百分点,说明50年代推行普通话之初效果显著。之后速度减缓,51~60岁年龄组普通话变式的使用率仅比61~70年龄组高出五个百分点,说明普通话推广10年在取得了一定成效后,速度相对放慢,增速相对平稳。随后在31~40岁年龄组有了大的飞跃,比上一年龄组增长17个百分点,这一时期是80后出生的一代,是伴随着改革开放大潮和经济突飞猛进成长的一代人。这一时期社会的重大变革自然也反映在语言使用的变化上。从以上年龄组阴平调普通话变式的使用变化可见,至少在50年左右的时间里,大连方言的阴平调发音一直处于不断的变化中。尽管在这段时间里无人连续记录其读音的变化过程,但是这一历时的变化过程可以从不同年龄段发音人的共时差异中找到。

社会语言学认为,通过研究表现在年龄段上的变异分布趋势来研究进行中的语言变化。但同时,还应该将“显像时间”(apparent time)的研究和“真实时间”(real time)的研究结合起来进行考察。前者是指在共时的变异中找出年龄差异的研究,后者是指从不同时间中获取同一变异材料变化的研究^①。上

述研究证明,大连方言阴平调普通话变式的使用与年龄密切相关,年龄越大,普通话变式的使用率越低。随着年龄的降低,使用率越来越高。这一“显像时间”的研究说明大连方言阴平调发音在几代人中正经历着变化。已有研究认为,大连方言阴平调是个降调^{②③④}。将本文的显像时间研究结合已有的真实时间研究,可以确定,大连方言阴平调发音是一个正在进行中的变化,随着时间的推移,其普通话的高平调变式(V2)最终会取代当地方言的降调变式(V1)。

(二)职业因素与阴平调变异

社会语言学认为,在大城市中,社会阶级是区分言语行为的可靠标准。由于中国目前没有严格意义上的社会阶级划分,所以国内的社会语言学调查多采用职业因素来代替西方社会语言学家所使用的阶级因素,因为在很大程度上职业是社会阶级的反映。一般说来,职业好,社会地位就高。正如戴庆厦所说:“一定的职业或行业需要并形成适合自己特点的语言形式,这些语言形式不仅有利于职业领域的内部交流,同时也成为职业身份最明显的语言标记。”^⑤

排除学生组,将其他被试按照职业大致分为以下五组(已退休人员按其在职时的职业分组)^⑥。具体情况见表3。

①陈松岑. 语言变异研究[M]. 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1999:199.

②宋学. 辽宁语音说略[J]. 中国语文,1963(2):104-107.

③贺巍. 东北官话的分区[J]. 方言,1986(3):179.

④高玉娟. 大连方言声调研究[M]. 大连:辽宁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52-56.

⑤转引自李伟. 汉语阳泉方言语音变异研究[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100-101.

⑥高玉娟. 语言变异视角下的锦州方言语音研究[J]. 辽宁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40(5):93.

表3 职业与阴平调普通话变式使用百分比的平均值

职业	发音人数	普通话变式(V2)平均使用率/%	标准差	标准误差
无业人员	8	34.38	30.66	10.84
工人	20	37.10	26.69	5.97
服务人员	21	48.02	32.15	7.01
文员	33	65.15	30.93	5.38
教师	6	68.07	28.08	11.46

表3显示,不同职业群体普通话变式使用有一定差异。无业人员组的使用率最低,为34.38%,教师组使用率最高,为68.07%。单因素方差结果为,显著性概率 $P=0.000<0.05$,说明从总体上看,上述不同职业组在使用阴平调普通话变式上具有显著区别,阴平调普通话变式的使用因职业不同而不同。

表3显示的数据是一个综合的结果。为比较任

意两个职业组间是否存在统计学意义上的显著差异,我们又做了多重比较分析,结果表明,并非所有组别之间差异都显著。差异显著的组有“教师组”和“无业人员组”之间、“教师组”和“工人组”之间、“文员组”和“服务员组”之间、“文员组”和“无业人员组”之间差异显著。表4列出了有显著差异的各比较组间的显著性概率sig.值。

表4 阴平调普通话变式使用上有显著性差异的职业组

比较组			比较组		
组1	组2	显著性概率(sig.)	组1	组2	显著性概率(sig.)
教师组	无业人员	0.041	文员组	服务人员组	0.045
教师组	工人组	0.030	文员组	无业人员组	0.011

如果将无业人员、工人和服务人员归入体力劳动者组,将文员和教师归入脑力劳动者组的话,那么可见,两个脑力劳动组间没有差别,三个体力劳动组间也没有差别,而脑力劳动者组与体力劳动者组之间差异显著。

(三)教育因素与阴平调变异

语言变异理论认为,文化差异是影响语言变异的重要社会因素。一般说来,所接受的教育程度越高,对于有声望的标准语的接受能力越强,越容易受标准语的影响。本文在考察大连方言阴平调发音的变异时,联系了被试的受教育程度,以考察阴平调变异与教育程度之间的关系。本文按照学历将全体成人被试分为6组:小学及以下文化程度组、初中组、高中(中专、技校)组、大专组、本科及以上组和在读学生组。由于在读学生(大、中、小学生)目前并未完成

学校教育,故而我们将这一部分被试单独列为“在读学生组”进行考察。

表5显示,受教育程度不同的群体,阴平调普通话变式的使用有一定程度的差异。受教育最少的小学文化组,普通话变式使用率最低,为33.34%,随着受教育程度的提高,使用率逐渐提高,本科及以上高级文化程度组的使用率上升至76.76%(不算学生组),为最高。那么这种差别是否构成统计学上的显著差异呢?为此,我们做了单因素方差分析,结果显示,显著性概率 $P=0<0.05$,说明总体上说,上述不同学历组在使用阴平调普通话变式上具有显著区别。但这是一个综合结果,为了考察任意小组间是否有显著差异,我们又做了多重比较。表6列出了有显著差异的几个组间的概率值。

表5 学历与阴平调普通话变式使用百分比的平均值

受教育程度	发音人数	普通话变式(V2)平均使用率/%	标准差	标准误差
小学及以下	5	33.34	28.23	12.63
初中	19	47.37	28.87	6.62
高中	25	48.00	32.46	6.49
大专	20	56.93	30.25	6.76
本科及以上	19	76.76	27.00	6.19
在读学生	18	79.17	23.09	5.44

表 6 学历组在阴平调普通话变式使用上的显著性差异情况

比较组		显著性概率(sig.)	比较组		显著性概率(sig.)
组 1	组 2		组 1	组 2	
本科及以上	小学组	0.003	在读学生组	初中组	0.001
本科及以上	初中组	0.002	在读学生组	高中组	0.001
在读学生组	小学组	0.002	在读学生组	大专组	0.000

表 6 显示,本科与小学组之间、本科与初中组之间显著性概率均小于 0.05,说明有显著差异。另外,小学、初中、高中和大专四个程度组与在读学生组之间的差异均显著。虽然其他组别间的差异尚未达到统计学上的显著性,但直接统计数字还是能够表明差异趋势的存在。

可见,大连方言阴平调普通话变式的使用与受教育程度有关。总体说来,受教育程度越高,普通话变式的平均使用率就越高。这表明教育对人们语言的影响巨大。由此可推测,随着教育意识的不断增

强及国民的受教育水平的不断提高,方言变式的使用将逐渐萎缩,最终将逐步被普通话代替。

(四)性别因素与阴平调变异

社会语言学认为,由于男女在承担的社会责任方面以及社会对其期望和要求等方面的差异,造成男女在语言使用上存在明显的区别,一般说来,女性会更更多地使用有声望的语言形式^①。为了研究大连方言阴平调两个变式在使用上是否存在性别差异,本文将全体被试按照性别分成两组,其中男性 46 人,女性 60 人。具体数据见表 7。

表 7 性别与阴平调普通话变式使用百分比的平均值

性别	发音人数	普通话变式(V2)平均使用率%	标准差	均值标准误
男	46	51.82	32.15	4.74
女	60	61.24	32.21	4.16
合计	106	56.53	32.18	4.45

数据显示,在阴平调变异上,女性普通话变式的平均使用率高于男性近 10 个百分点。对两组

被试普通话变式的使用进行独立样本检验,结果见表 8。

表 8 性别组独立样本检验结果

项 目	均值方程的 <i>t</i> 检验				
	<i>t</i>	<i>df</i>	sig.(双侧)	均值差值	标准误差值
假设方差相等	-1.495	104.000	0.138	-9.426 6	6.306 9
假设方差不相等	-1.495	97.080	0.138	-9.426 6	6.305 1

其中, sig. = 0.138 > 0.05, 说明男女两性在阴平调普通话变式的使用上不具有显著差异。上述只是一个综合的结果,因男女不同性别组所包含的被试在年龄、职业等社会因素上差别很大,所以我们认为,如果将所有被试笼统分成男女两组则不够严谨,如果将同一年龄层上不同性别被试者的发音情况进行对比,会更好地说明性别因素与语言使用的关系。据此,本文对相同性别的被试又细分为青年组(34 岁

以下)、中年组(35~60 岁)和老年组(61 岁以上)。具体性别次小组普通话变式的使用情况见表 9。

表 9 直接数据显示,中年的女性普通话变式使用率为 60.15%,高于中年男性的 52.68%。同样,青年女性使用率为 71.80%,高于青年男性的平均使用率 62.80%。上述简单统计的数据显示同一年龄段不同性别间在使用普通话变式上是具有一定差异的。然而方差分析结果显示,老年组

① HUDSON R A. Sociolinguistics[M].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2000: 195.

两性间显著性概率 $\text{sig.} = 0.702 > 0.05$, 中年组两性间的显著性概率 $\text{sig.} = 0.689 > 0.05$, 青年组两性间的显著性概率 $\text{sig.} = 0.148 > 0.05$ 。以上三组数据说明, 相同年龄段不同性别之间被试在使用阴平调普通话变式上尚未达到统计学上的显著差异。

表9 各年龄段不同性别发音人语音变异情况

年龄段	发音人数	普通话变式(V2)平均使用率/%	标准差	标准误差
老年男性	12	38.90	27.13	7.83
老年女性	11	38.64	24.50	7.39
中年男性	19	52.68	29.94	6.87
中年女性	23	60.15	32.65	6.81
青年男性	15	62.80	35.47	9.16
青年女性	26	71.80	30.46	5.97

五、变异原因分析

社会语言学认为, 语言变异的原因很多, 但从大方面来看, 主要来自语言结构系统内部和语言结构系统外部两个方面。我们认为, 大连方言阴平调的发音变异既有语言内部原因, 又受到了语言外部力量的强大推动, 而后者恰是变异的主要原因。

(一) 遵循发音省力原则

人类语言的发音主要遵循“省力原则”和“清晰原则”。省力原则是说发音要在不影响交流的前提下用尽可能少的形式去负荷尽可能多的信息。大连方言阴平调的发音是一个降调, 而普通话的阴平调是一个高平调。大连方言的发音相对普通话要更吃力一些^①。在普通话强有力影响下大连方言的阴平调发音接受普通话发音形式而靠近标准语, 这无疑遵循了发音省力原则。

(二) 普通话的强大推动

“一个变化的启动和发展总是需要一股相当强的社会推动力量”^②。自国家大力推行普通话标准语以来, 普通话在人们的工作、学习和生活中占据了越来越重要的地位, 不仅各级各类学校的教学语言使用普通话, 甚至在家庭、商场这样的日常交际场所普通话的使用率也越来越高。大连本地方言语音一统天下的局面被打破。从我们所做的对大连市民语言使用的调查可见, 虽然大连方言仍是大连市民所习

得的第一语言, 但是, 随着被试的年轻化, 最先学会普通话者的人数比例在上升, 38%的青年人习得的第一语言是普通话。不仅如此, 大连市民学会说普通话的年龄也越来越早, 77%的青年被试在6岁之前就已经掌握普通话, 且50%多的青年人认为自己的普通话比地方话更流利更标准。就普通话使用场合来说, 虽然家庭仍以地方话为主要交流语言, 但是家庭所提供的普通话环境也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23%的青年人在家庭与父母说话时使用的是普通话而非大连话, 另外, 在学校和工作单位等正式场合, 分别有59%的学生和50%的青年人即使是在与同学和同伴交流时, 也使用普通话。可见普通话在大连人生活中扮演了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而大连话的使用范围受普通话的强烈冲击而萎缩, 自身的稳定已动摇, 其发音越来越向普通话靠近。

(三) 语言态度的影响

语言态度是指人们在社会认同、社会情感等因素的影响下, 对一种语言价值所形成的认识和评价。对某种语言的评价态度会直接影响对该语言的选择与使用, 并最终影响该语言的变化和发展进程。不同社会身份的人对同一语言所具有的不同语言态度使得他们在传达同样信息时选择不同的言语形式^③。高玉娟(2007)对大连人语言态度调查显示, 人们对普通话的评价普遍高于当地方言, 44.7%的被调查

①高玉娟. 大连方言五项语音变化的社会语言学分析[M]. 南开语言学刊, 2005(5): 54-57.

②徐大明, 陶红印, 谢天蔚. 当代社会语言学[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7: 136.

③刘虹. 语言态度对语言使用和语言变化的影响[J]. 语言文字应用, 1993(3): 93.

者认为大连话不好听,发音土气,大连话是文化和素养低的象征,青年群体中 21% 的人明确表示不愿意自己的孩子将来说大连话^①。由于受到语言态度的制约,人们在使用阴平调变项进行交流时,会更加注意选择声望高的普通话变式。大连人的语言态度使大连话阴平调变项的发音正向普通话方向演变。

(四)人口流动的影响

大连虽说是一个移民城市,但改革开放以前因其地处辽东半岛最南端,交通不发达,城市相对封闭,外来人口少,居民主要是山东移民的后裔,所以他们之间交流主要是当地话。随着改革开放、经济大潮的到来,大连无论在居住环境上还是在旅游资源上以及投资创业等方面都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的优秀人才安家落户。许多新移民学历高、层次高,其交流主要使用声望高的标准语,这无疑带动了当地居民发音的变化。另外,当地人在与来自其他方言区的从事建筑行业和服务行业的务工人员交流时不

得不选用双方都能听懂的普通话作为沟通语言。在这样的巨大外来人口冲击下,大连方言语音变得越来越萎缩,而普通话的使用范围越来越大,使用频率越来越高,当地方言语音向共同语越来越靠拢。

六、结 论

社会的巨大变革、经济的迅猛发展及人口不断流动为大连方言的变化和发展带来了挑战。大连方言语音在普通话强烈冲击下正发生着变异与变化,代表大连方言典型语音特点的阴平调发音的变异是一项正在进行的变化。变异体现一定的社会分层,不仅与说话者年龄密切相关,还与受教育程度、职业有关。阴平调发音的地方变式虽不会在短时间内消失,但其普通话变式的使用率越来越高,向普通话靠拢的趋势越来越明显。普通话的大力推行和普及是引发变异的强大社会动力,语言心态和人口流动等的影响也是大连方言阴平调变异的重要原因。

Sociolinguistic analysis of the sound variation of tone 1 in Dalian dialect

Gao Yujuan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Liaoning Normal University, Dalian 116029, China)

Abstract: By employing the theory and methods of language variation of sociolinguistics, the paper tries to find out and analyze the social factors influencing the variation of Tone 1 that most characterizes the local accent of Dalian dialect to show the possible tendency of the dialect based on the pronunciation of the subjects selected in the urban area of Dalian by snowball sampling. It turns out that the sound change of Tone 1 in Dalian dialect is in progress. The sound variation of the tone is socially stratified, i. e. it is associated with the factors of age, education and occupation. The study shows that the pronunciation of the tone is getting closer to that of Putonghua though the local one will exist for quite a while. The change is greatly caused by the wide popularization of Putonghua as well as language attitude and population mobility.

Key words: sociolinguistics; Dalian dialect; Tone 1; language variation

〔责任编辑:李宝贵〕

^①高玉娟. 大连方言声调研究[M]. 大连:辽宁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201-204.